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2-0133-06

“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两岸经济的繁荣

张 德 明

[摘 要] 通过对1979年以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考察,可以揭示出“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两岸经济的繁荣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关系:当“一个中国”的原则得到坚持的时候,台海两岸就呈现和平友好的局面,两岸经济交往就顺利、兴旺,两岸内耗就减少甚至避免,可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就增多。当“一个中国”的原则受到挑衅的时候,台湾海峡就呈现武装对峙、刀光剑影的形势,两岸经济交往的发展就举步维艰,两岸内耗就增加,集中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就减少。而台湾海峡的和平局面、两岸积极的经济交往以及减少甚至避免内耗、最大限度地将资金用于经济建设是两岸经济繁荣的三个基本条件。因此,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两岸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30年间台湾经济的沉浮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 “一个中国”;两岸经济;繁荣;决定因素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台湾海峡两岸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但鉴于两岸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要实现这一美好愿望,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两岸积极的经济交往;两岸避免内耗、将国民财富最大限度地用于经济建设。而这三个条件的营造有赖于一个前提: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鉴于还未见到有专门研究“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两岸经济的繁荣之关系的成果,本文试图探讨之。

一、“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海峡的和平

众所周知,和平稳定是两岸经济发展的前提。那么,台海和平与否的关键是什么呢?那就是:是否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之后,台海环境的好坏取决于是否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指出:“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1](第1版)该文发表后,由于两岸共同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两岸关系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长期隔绝状态被打破,交往日益密切。1990年11月,台湾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其主要任务是执行“政府”委托办理的两岸民间事务。1991年3月9日,海基会正式挂牌运作,以“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为宗旨。大陆方面“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会)于1991年12月成立。它是一个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宗旨的团体。1992年,两会在香港达成“九二共识”^①，“九二共识”进一步肯定了“一个中国”的原则。1993年4月27—29日,在新加坡,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融洽的气氛中就两岸经济合作、科技文化交流、两会会务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共同签订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2](第78-87页),为两岸事务性交流掀开了新的一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海基会和海协会的成立及其宗旨、“九二共识”的达成以及《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的签订等等,都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具体表现。总之,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一个中国”的原则使台海出现了令全体中国人欢欣鼓舞的和平稳定的新局面,反过来,和平稳定的环境又加强了海峡两岸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

正当台海和平气氛与日俱增之际,“台独”的阴云悄悄出现。上台不久,起初曾主张“一个中国”政策的李登辉,在“苏东剧变”的国际环境下,为配合西方反华势力的图谋,从90年代中期起,逐渐背叛“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1995年6月,他在康乃尔大学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3](第189页),1999年又宣扬两岸为“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4](第318页)的“两国论”。陈水扁与李登辉一脉相承,上台之初,还煞有介事地承诺“四不一没有”^②,但不久就有计划地推行“台独”路线:杜撰“一边一国”论^[5](第47页),策划“法理台独”,制定“台独”时间表,搞“去中国化”,最后,终止“国统会”运作,终止“国统纲领”适用,在背弃“四不一没有”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由于李登辉和陈水扁恶意挑衅“一个中国”原则,结果,破坏了台海和平氛围,使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与“台独”势力之间的对峙与斗争不断升级。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出现了两次“台海危机”^③。同时,大陆方面还以法律为武器,反对“台独”。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将中央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充分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共同意志和坚定决心。

面对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强决心,陈水扁施展“以武谋独”的伎俩相对抗:打造“扁家军”;台军实施调整外岛和部队东移军事战略,以“反制”大陆;重视和抓紧军事演习。例如,2006年举行以解放军为假想敌的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汉光22号”演习,和2007年台湾七大战区全部参加、动员人力达10万之众历时4个月之久的“汉光23号”演习。

由此可见,由于“一个中国”的原则受到“台独”势力的践踏,和平稳定的台海变成了刀光剑影的潜在战场;美丽的台湾岛变成了族群倾轧、经济滑坡的角斗场。

“多行不义必自毙”,陈水扁之流倒行逆施搞“台独”,最后被台湾人民所抛弃。2008年5月,马英九和国民党执掌台湾政权以来,两岸重新确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使和平的局面重归台海。由于共同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两岸政治互信不断增强,海协会与海基会恢复协商并签署九项协议。两岸迈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新时期。

1979年至2009年30年的海峡两岸关系史充分说明:“一个中国”的原则什么时候能得到坚持,台海什么时候就有和平、就有光明,1979年至1995年和2008年至今这两个时期就是如此。“一个中国”的原则什么时候受到挑衅,台海什么时候就是剑拔弩张、乌云密布,1995年至200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台海的和平是两岸经济繁荣必不可少的大前提。

二、“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两岸的经济交往

两岸经济繁荣依赖于两岸的经济交往,而两岸经济交往能否发展则取决于能否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三通”可以说是“两岸经济交往”的集中体现^④。《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希望双方“通航通邮”,“发展贸易”,从而确立了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实现两岸“三通”的基本精神。两岸海运、空运直航以及直接通邮终于在2008年12月15日正式启动,直接“三通”得以基本实现。但“三通”从提出到实现却经历了30年的漫长时间。这是为什么?

1979年至1995年是两岸经济交往中断30年之后从无到有的起步时期。对于《告台湾同胞书》,蒋经国起初以“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相回应。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阐述了中国政府和政府对两岸和平统一与两岸往来的一系列重要政策主张,再次呼吁双方为“三通”而达成

有关协议。1988年5月,台湾当局提出了“民间渐次开放”的“单向间接原则”。于是,两岸经济关系逐步建立起来。主要表现为:在民间层面,两岸实现了通过第三地的通邮、通电话和两岸贸易。1988年7月,《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颁布。1992年,台湾当局允许台湾同胞经第三地对大陆间接投资和进行技术合作。两岸民间开始接触,商讨空中和海上通航事宜。台湾官方对大陆的呼吁也作出了积极响应:1991年2月台湾当局在制定的《国家统一纲领》中,将“开放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列入中程阶段。1995年12月,经澳门的两岸空中航运开通。纵观这16年两岸经济交往,可以说是进展不快,但开端良好。这主要是受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双方之间的互信短期内难以建立,台湾当局在“三通”问题上十分谨慎;二是这一时期,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从民族大义出发,都希望发展两岸经济关系。因此,两岸经济交往开始了破冰之旅,并逐步发展起来。

1995年至2008年5月,两岸经济交往继续发展但一波三折。两岸贸易1978年为0.46亿美元,截至2007年11月底,两岸间接贸易总额累计已达7164亿美元。大陆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根据台湾有关方面统计,截至2007年11月底,大陆累计吸收台湾直接投资453.3亿美元。尽管两岸经济交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交往仍处于间接、单向、局部的状态,影响经济交往的关键即直接“三通”问题未能解决。两岸邮件、船舶、飞机和货物都得经过香港、澳门和日本等第三地。大陆市场向台湾企业和商品全面开放,而大陆输台产品却受到诸多限制,大陆的企业不能向台湾投资。

阻碍直接“三通”的根子仍在“台独”分子。2003年7月,陈水扁说:台湾“不能为了‘三通’而‘三通’”,“如果为了‘三通’而被迫接受‘一中原则’,宁可不要‘三通’”。2005年8月,李登辉说他自己不是反对“三通”,而是坚持必须以“国对国”为唯一条件。他们一方面通过否认“九二共识”,使得两岸对话无法恢复;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民间组织协商的办法,导致“三通”商谈难以开启。事实充分说明,1995年6月至2008年5月直接“三通”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于“一个中国”的原则受到践踏。

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主政后,两岸经济交往峰回路转。2008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会见了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胡锦涛强调,国共两党应该共同把握和利用好难得的历史机遇,继续依循并切实落实“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吴伯雄表示,台湾的主流民意期盼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搁置争议、追求双赢^[6](第1版)。在两岸执政党领导人首次会谈精神的指导下,两岸交往步伐加快,不断取得新成果。2008年6月12日,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北京举行了会谈,重启中断近10年的两会协商。两会签署《海峡两岸包机会谈纪要》和《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7](第1版)。7月4日,两岸周末包机顺利启航,同日,大陆居民赴台旅游首发团抵台,揭开两岸旅游历史性的一页。11月3—7日,陈云林与江丙坤在台北举行会谈,共同签署了空运、海运、邮政、食品安全等四项协议^[8](第6版)。这是1949年以来大陆授权最高层级的谈判代表赴台,标志两岸制度性协商管道正式建立,两岸关系进入和解合作、良性互动的新时期。12月15日,根据台北会谈协议,两岸海、空直航及直接通邮正式启动,两岸直接“三通”基本实现,两岸关系跨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2009年4月底,陈云林与江丙坤在南京签署了《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和《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于6月25日正式生效。这标志着两岸交往由基本“三通”升级为完全“三通”,表明两岸在经贸正常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由上可知,“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两岸经济交往的决定性因素。1979年至1995年5月,由于两岸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两岸经济交往在中断30年之后开始恢复。1995年6月至2008年5月,因为李登辉和陈水扁推行“台独”路线,两岸经济交往虽在发展,但两岸交往的核心即直接“三通”却是镜中花、水中月。而马英九主政台湾的短短一年时间,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岸直接“三通”就成为了现实,原因何在?因为两岸在马英九执政以来,很好地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马英九抛弃了陈水扁“一边一国”的“台独路线”,坚持“九二共识”,从“一中宪法”、“内战观”^[9]的角度将两岸定位为“一国两区”,为两岸“三通”的实现提供了良性的政治条件。

三、“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两岸内耗的避免

两岸能否避免内耗、将国民财富最大限度地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用于军备、“外交”之上,是两岸经济繁荣的关键,而这同样取决于两岸能否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李登辉、陈水扁为了分裂中国,搞“以武拒统”、“以武谋独”。通过大肆渲染“大陆军事威胁论”,为“以武拒统”、“以武谋独”制造“理论和事实依据”。他们不断增加军事开支,花巨额资金购买先进军事装备。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4年,台湾军费开支年均约为100—110亿美元。2008年3月,陈水扁将该年度军费开支提高到3495亿新台币(112.7亿美元)。除了官方公开公布的军费支出外,台湾军费开支中隐蔽军费所占的比例达30%以上。1994—1998年的5年间,台湾武器进口总值达113.11亿美元,居全球之冠。陈水扁上台后,又掀起新一轮的武器装备采购高潮。从1996—2003年的8年间,台湾军购总额接近200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二。据统计,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美英两国,其国防预算分别占税收的10%和8%。而台湾一个弹丸之地,仅一般的“国防预算”就占税收的20%,再加上特别预算,一共要占到税收的30%,是美国的3倍。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为了“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李登辉、陈水扁使台湾一直保持着与自身经济规模极不相称的高额军事开支,使台湾民众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这样一种情况怎能不拖台湾经济发展的后腿呢?

“台独”势力“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伎俩也使得大陆方面不得不适当地提高军事开支,因为要保持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要执行《反分裂国家法》,就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针对陈水扁撤销“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倒行逆施,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姜恩柱宣布,新的国防预算为2838亿元人民币,约合351亿美元,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长幅度达14.7%。在陈水扁搞“入联公投”的背景下,2008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姜恩柱透露,2008年中国国防费预算为4177.69亿元,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加623.79亿元,增长17.6%,约合572.29亿美元。

李登辉、陈水扁对内挑衅“一个中国”的原则,搞“台独”,对外自然就推行“金钱外交”,花巨资收买某些国家的政客,游说该国高官或政府支持他们的“台独”行径。卡西迪公司在1995年成功游说美国国会,导致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为此,台湾在美国的公关代理费超过1000万美元^⑥。1995年台湾当局还向联合国提出,用10亿美元的巨款换取联合国国籍,但遭拒绝。陈水扁继承了李登辉“金钱外交”的衣钵。在2003年7月,台湾监察部门发表《台湾现行援外方式之利弊》的期中报告指出:自2000年度以来,“援外经费”从1999年3.6亿美元增加到7.9亿美元,以后几年也是居高不下,70%的“援外经费”用于巩固“邦交”。2006年9月初,陈水扁在所谓的“第一届台湾与太平洋国家元首高峰会”举行之前就曾私下答应,愿意提供1000万美元的工程经费,协助改善所罗门各岛屿之间的航空交通。国民党“立院”党团副书记长林鸿池指出:陈水扁上任6年来“出访”10次,“援外”金额高达新台币2500亿元,但“邦交国”却从29个减为24个;陈水扁此次“出访”又带着“八大援助计划”,能达到什么“外交”成效,令人质疑。以上只不过是李登辉、陈水扁为了搞“台独”而推行“金钱外交”的几个例子,他们到底总共花了多少台湾的民脂民膏进行“金钱外交”,恐怕很难统计清楚,仅从上面几个例子来推测,数目是相当巨大的。

李登辉、陈水扁的“金援外交”也使大陆方面增加了外交成本。由于李登辉、陈水扁大肆推行“金援外交”,使得中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一些小国、穷国有机可乘,以“断交”相威胁,对台海两岸进行敲诈勒索,从而导致了两岸间的“外交挖墙脚”之战。

马英九执政后,台湾的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马英九将“外交休兵”作为其施政理念。他先后三次出访都坚持不带一张支票,拒绝了某些小国的“金援”要求。从经济上考虑,若马英九这一举措能够成功的话,那么以后南美、非洲、大洋洲的一些小国,以欲与祖国大陆建交相要挟,向台湾当局敲诈勒索“金援”,就不会如愿以偿了。这无疑会给台湾节省巨额的“外交”开支。马英九的“外交休兵”实质上是与以“台独”为宗旨的“金援外交”相反的,是“九二共识”基础上的“一中外交”。“一中外交”就是海峡两岸的

中国人共同打造的“中华民族外交”。正因为如此，对马英九的“外交休兵”，大陆方面也已予以“默契”配合。马英九证实，曾有某些“邦交国”要求与北京建交，北京出于正面响应“外交休兵”的考虑，婉拒了此要求，因而使得台湾得以维持28个“邦交国”^①。

从上述可见，由于李登辉和陈水扁挑衅“一个中国”的原则，搞“台独”，“以武拒统”、“以武谋独”和推行“金钱外交”，结果花费巨额资金购买军事装备和收买大国政要和小国，既得不偿失，也使相当部分资金不能用于发展台湾经济。李登辉和陈水扁“台独”的图谋也使大陆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和捍卫“一个中国”的原则而在军备和外交上增加开支，导致两岸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巨大内耗。马英九摒弃了李登辉和陈水扁的“金钱外交”，推行“九二共识”基础上的“外交休兵”，得到了大陆方面的配合，节约了巨额“外交”开支，减少和避免了内耗。事实说明，只有两岸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加强政治互信，才能减少和避免内耗，使更多的资金能投放在两岸经济建设上。

四、结 论

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与繁荣离不开三个基本条件：(1)台海和平稳定。海峡的战争将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使两岸经济大倒退。海峡两岸的武装对峙也会阻碍两岸经济的发展。因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经济繁荣最起码的条件。(2)海峡两岸的经济交往。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对方，两岸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如果两岸的经济交往不尽如人意，则两岸的经济发展会大大滞后于亚太其它国家和地区。(3)避免内耗，使两岸的国民财富被最大限度地用于发展经济。两岸经济要繁荣，首要的一点就是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若将有限的财富大量地用于军备、“外交”等方面的内耗而不用用于经济建设，则两岸经济的繁荣是句空话。而这三个条件的营造都离不开“一个中国”的原则，只有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才有台海的和平稳定，才有两岸红火的经济交往，才能减少和避免内耗，使两岸的国民财富被最大限度地集中用于发展经济。1979年至今30年台湾经济的沉浮从正反两方面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1995年至2008年5月间，由于李登辉和陈水扁挑衅“一个中国”的原则，推行“台独”路线，结果，台湾的经济渐渐滑坡。到李登辉下台的2000年，台湾出口订单大量流失，失业率急剧上升，资金和产业外移速度加快，岛内民间消费屡创新低。至于陈水扁的统治给台湾造成的经济后果，台湾《经济日报》2008年2月28日社论说得很清楚：“台湾20年前为四小龙之首，最近八年有四项指标沦为四小龙之末，变成龙尾。台湾经济在20年前的坚实的基础上，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怎不令人痛心疾首！”马英九执政以来，承认“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两岸直接“三通”得以实现，两岸正在落实所签署的各项协议，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异军突起，大陆大型企业赴台采购方兴未艾，“陆资赴台”将对台湾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这些举措正对推动台湾经济复苏和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使台湾经济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袭击及国际油价急升等极为不利因素的冲击之下，仍能表现得比其它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要好。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及所导致的经济表现与李登辉和陈水扁的两岸政策及所导致的经济后果雄辩地说明：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两岸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前提和决定性因素。

注 释：

① “九二共识”，即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协会和海基会在香港商谈中，就海峡两岸事务性（公证书使用）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海协会的基本态度是，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应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协商解决。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协商。海基会代表拿出了他们的最后表述内容：“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还建议“用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香港商谈结束后不久，1992年11月16日，海协会正式致函台湾海基会表示，“在这次工作性商谈中，贵会代表建议在相互谅解的前提下，采用贵我两会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并提出了具体表述内容，其中明确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会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现将我会拟作口头表述的要点

函告贵会: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本此精神,对两岸公证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海协会的函后并附上了海基会最后提供的表述方案。12月3日,海基会回函海协,对达成共识未表示异议。参见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3>。“九二共识”形成的详情请见:《台湾问题实录》下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793-796页。

- ② 即“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李登辉的‘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
- ③ 针对李登辉1995年6月在康奈尔大学鼓吹分裂的言论,人民解放军于1996年3月在台海进行导弹发射训练,两枚导弹的攻击区域正好封锁了整个台湾岛。美国害怕局势失控,派遣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台湾附近游弋。这就是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又一次“台海危机”接踵而来。李登辉于该年7月9日在接受德国广播采访时提出“两国论”,激起了大陆方面的强烈反应。8月下旬、9月初和9月上旬,人民解放军空海陆军和几大军区在台海地区举行了几场大规模的单独和诸兵种联合演练,给“台独”分裂势力以当头棒喝。
- ④ “通邮”、“通航”和“通商”既是经济交往的必要条件,其本身又是经济交往的表现。
- ⑤ 2008年8月23日,马英九说:“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不能再重演内战。”2009年4月,他在一次专访中说:“中华民族再从事内战是人类的悲剧”。参见《快评:张荣恭明确解释 马英九内战观清晰》,载中国评论网2009年4月24日。
- ⑥ 李登辉为达到访问康奈尔大学之目的,透过亲信刘泰英所主持的台湾综合研究院聘请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在美进行游说,三年的合约就花了570万美元。根据美国司法部长给国会的报告,1991年全年内,司法部登记有案代理台湾的说客公司或个人共计51家,获得报酬总数为510.3万美元,如果加上台湾综合研究院大手笔的570万,台湾在美国的公关代理费超过1000万美元。参见《用重金敲开访美大门》,载《参考消息》1995年6月13日。
- ⑦ 参见《新华澳报:马英九出访“一中外交”赢尊严》,载中国新闻网2009年7月6日。

[参 考 文 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载《人民日报》1979年1月1日。
- [2] 杨荣华等:《九十年代两岸关系》,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
- [3] 许介麟:《李登辉与台湾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 [4] 刘国基:《“两国论”全面观察——李登辉逊位前的世纪末豪赌》,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年版。
- [5] 刘红:《民进党执政状况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 [6] 王尧、吴亚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举行会谈》,载《人民日报》2008年5月29日。
- [7] 吴亚明、王尧:《胡锦涛总书记会见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载《人民日报》2008年6月14日。
- [8] 孙立极、姚小敏:《两岸进入制度化协商轨道》,载《人民日报》2008年11月8日。

(责任编辑 桂莉)